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线装书历史札记

宋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出版社

一、马来亚大学与《古今图书集成》

记得是 2012 年 12 月某日, 当时马来亚大学(简称“马大”)东亚图书馆管理员潘玉婷小姐把馆长转给她的一封邮件打印下来询问我。邮件附件有 1960 年代英文报纸上捐赠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古籍的新闻, 捐赠者的后人持当年的新闻复印件来询问这批古籍的下落, 其中就有 18 世纪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马大东亚图书馆的线装书原来是在总馆四楼中文图书馆。2000 年左右, 中文图书馆搬迁到现在 ZA'BA 四楼, “中文图书馆”的名称被取消, 与日文和韩文书籍合并, 合称为“东亚研究图书馆”(East Asia Studies Library)。现在已经找不到这套《古今图书集成》线装书。由于潘小姐任管理员仅仅四年, 搬迁之前的情况她也不太了解。我当时猜测 1963 年马大吉隆坡校区中文系招收第一届学生, 既然这套书没在吉隆坡, 那就是可能捐给了当年还在新加坡的马大。新马分家后那部分就成为新加坡大学的马大。80 年代和南洋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因此这套书可能在那里。线索到此暂时中断了。

COLLECTION OF OLD BOOKS FOR VARSITY

From OH KEE TIANG

PENANG, Saturda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will soon be enriched by a collection of about 3,000 precious books, some over 200 years old.

Representing the lifetime collection of the late Mr. Oon Boon Tan, an early pioneer from Fokien Province, the books will be formally presented to the University at a ceremony next Saturday.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made by Mr. Oon Khye Beng, a rubber merchant, on behalf of the Oon family, to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his late father.

Education

Printed on rice paper, the books have been remarkably well preserved.

Among them is a complete set of the "Kor Kim Tor Soo Chip Seng"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printed in 1727 by imperial command of Emperor Khing Hse, which runs to 1,628 books.

The late Mr. Oon Boon Tan, who emigrated to Malaya in 1880,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education, although he himself had no opportunity to attend school in his early days.

By dint of hard work, he educated himself and became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Penang tin exchange and pepper trad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is literary associates included prominent scholars from Foochow who visited Malaya, and with their help he started a collection of old Chinese books o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science and other subjects.

While the late Mr. Oon was keen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education, his children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English education.

One of his sons, Mr. Oon Khye Beng, was a Queen's Scholar. Another, Mr. Oon Khye Klang, is now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in Singapore while a daughter, Dr. Oon Chiew Seng, is the only woman 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 in Malaya.

When Mr. Oon Boon Tan died in 1930 at the age of 67, his collection of books was kept in the family house at Scotland Road, Penang.

But now, with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esta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Oon family has decided to donate the whole collection to the university.

THE LATE MR. OON

Family house

资料来源: 潘玉婷提供, 2013 年。

图一 载于 The Sunday Mail 报纸上的捐赠图书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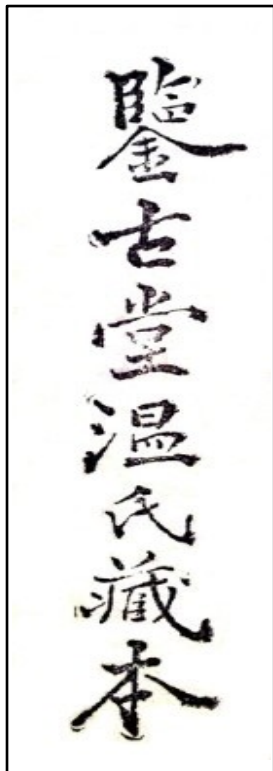
*宋燕鹏,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出版社编审、教授。

事情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刻。因为全力展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2013年6月份开始翻阅马来西亚华文旧报纸，在7月份看到1963年有关马大中文图书馆的新闻介绍。为了配合马大吉隆坡分校中文系的开设，从新加坡校区转来一批古籍，而后槟城闻人温文旦先生的二千本名贵藏书，也由其子女捐赠给马大中文图书馆。这批赠书中，就有一千多册的《古今图书集成》。据这篇中文新闻报导，以及上述英文新闻，就可以确定这套书当时是捐赠给了马大吉隆坡校区，而不是捐赠给新加坡校区。但是这套书后来几十年到了什么地方，不可知晓，但不可能丢失。一千多册全部消失不见，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可惜线索再次中断。

为了配合马大中文系50周年特刊的暂时存放，在2012年8月某日收拾中文系资料室，意外发现几个箱子内是线装书。打开一看，原来就是一直寻找中的《古今图书集成》。每册封面有“鉴古堂温氏藏本”、扉页有“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印章，证明就是当初1960年代中文图书馆成立时温文旦先生子女所捐赠的那一套。现在终于可以对槟城温氏后人有所交代了，并且让我来还原这套书的“流动”过程。中文系资料室原来是称“中文系图书馆”，改名资料室，其中温先生捐赠的线装书就多次转移到此，这套《古今图书集成》就保留在这里。1960年代的马大中文图书馆职员早期是中国南来者，受到过传统的古文教育，所以图书编目整理都不在话下。在1960、70年代，先后有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中国的钱穆教授、王叔岷教授等学术大师前来客座。如今懂古文繁体字的本地华人越来越少，甚至马大图书馆职员中连谙中文者都寥若晨星，必然造成减低古籍的受重视程度。这个状态可能是当初捐赠者所没有想到的。

《古今图书集成》为清朝陈梦雷、蒋廷锡等奉敕编纂，历时两朝二十八年，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年），正文10000卷，1亿6千万字，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清代总共印刷三次，分别是雍正六年（1728年）的初版；光绪十年（1884年）开印，十四年（1888年）印成的铅字版，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上海同文书局版。其中初版印刷校对上乘，但只印刷了64部，光绪十六年版印了100部（其中留在上海库房者为大火焚毁），流传有限。唯独光绪十四年的铅字版印刷了1500部，因为印刷数量巨大，所以校勘不精，讹脱颇多，不称善本，但从此该书广泛流传。马大这套书就是其中有幸流传到东南亚的少数几套之一，这归功于槟城的温文旦先生。

二、不应被遗忘的槟城闻人温文旦先生



资料来源：宋燕鹏
摄于2013年。

图二 马来亚大学
东亚图书馆线装书
之“鉴古堂温氏藏
本”印章

翻看马大东亚图书馆内的线装书，不时会看到书的封面印有“鉴古堂温氏藏本”字样。初次见到，还以为是中国江南某位藏书名家。不过，遍寻资料，所见中国的“鉴古堂”堂主却是姓吴。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不知这些书的来历。不过在发现《古今图书集成》之后，方才能够确定这些书的主人原是槟城闻人温文旦先生（Oon Boon Tan）。

1864年温先生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厦门附近的赤石（Ch'hia Tsio），他在1880年左右放弃科举南来槟城。刚来时他地位低下，经过艰苦奋斗，在20世纪初开设万得丰号，主营锡矿和胡椒贸易，后来又兼营树胶业，变成一名槟城闻人。他一生酷爱书画文章，藏珍丰富，名其寓所曰陶然楼，为流寓槟城士人与过境官吏谈文论艺之地。又和林博爱、林文琴发起“同文藏书楼”。温先生在槟城的华人社团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南华医院、福建联合公冢和其他华团的董事。对于他的社会活动，笔者所见仅知他于1906、1911、1912年曾任槟城平章会馆协理员，1914年任查帐员，1918年任职员。他热心公益，1911年槟城保安捐，他是吊头桥前头街、畚田仔、港仔墘的劝捐员；1912年是国民捐的劝捐员；1914年是南华医院福帮的劝捐员；1917年广福居演剧团为厦门风灾筹款，他任协理；1918年任槟城中学的临时查帐员，也是土库街的劝捐员；1927年李仲干先生书画助学展览会，他是名誉会长之一，并且捐赠一百元。1930年去世，享年67岁。

温先生有四子、四女。四子皆学有所长。长子温开封（Oon Khye Hong），毕业于槟城大英义学，随即去美国完成高等教育，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硕士（化学工程）。在他去世前任新加坡化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次子温开西（Oon Khye Kee）在槟城英华学校接受教育，继承父业，1953年退休。他热心公益，1940年曾代表槟城树胶公会赞助武汉合唱团的演出，1975年半价报效双溪大年老街场华文小学地皮四亩。三子温开明（Oon Khye Beng）在槟城大英义学接受教育，1927年获英女王奖学金赴剑桥求学，1930年获得机械科学学位，成

为马来亚第一个本土机械工程师，随后加入吉隆坡和怡保的采矿业，直至 1958 年退休。1976 年时在剑桥唐宁学院（Towning college）设立赤石信托基金（Ch'hia Tsio Trust Fund），名字即来自于其祖籍地，1992 年去世。四子温开强（Oon Khye Kiang）先后在槟城义学和莱佛士学院接受教育，毕业后历任新加坡治安法庭助理、遗产税署理专员、财政部常务秘书等职。代表温氏家族赠书马大者即是次子温开西先生。

在听闻马大吉隆坡校区要建立中文系之后，温氏家族子嗣决定将超过 2850 册的收藏捐赠给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62 年 10 月 13 日，马大和槟州政府 在 槟 华 女 中 礼 堂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赠 送 仪 式。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批赠书现存有 130 余种。内容上来看，如果以经史子集四部来归类的话，主要集中在集部和子部之内，尤其是集部就有 65 种，已然居半数之多。可知他的收藏内容重点所在。从集部作者的籍贯来看，温先生偏爱福建籍人所作。如福州侯官人陈寿祺，就有《左海诗钞》、《左海乙集骈体文》、《东越文苑后传》、

《东观存稿》、《洪范五行传》，漳州漳浦人蓝鼎元之《女学》、《鹿洲全集》、《东征集》，其中《鹿洲全集》即有二十册。闽县龚景瀚之《澹静斋诗钞》、《澹静斋文钞外篇》、《离骚笺》、《邶风说》、《澹静斋文钞》。三人的著作几乎全部网罗。此外福建籍文人著作如福州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侯官县林则徐《林文忠公诗集》、《林文忠公政书》（十五册）也被他购入。

有些书内还可见他的题注，从中可以略窥他的个人交游及某个时间的状态。譬如：“见道集十二卷，丁未初春闽友黄黻丞孝廉南来携以见赠，比云是其宗人艾庵近所编纂。斯时适值营业失败，无暇涉及，竟高阁置之。迨比家居得闲，取而翻阅，见其中援引古昔名言，辟除诸般迷信，实今日社会上之宝筏也。艾庵虽皈依耶教，而其一片救世心洋溢编上，孰谓道不同而行便异？读此集可以悟矣。光绪戊申小春上浣旭初志于槟榔屿寓斋。”光绪丁未年为 1907 年，戊申是 1908 年。黄黻丞即黄乃裳，清末举人，故称之为“孝廉”。黄乃裳少年入基督教，所以说“皈依耶教”，他曾于 1907 年春来槟榔屿前来拜访。



资料来源：宋燕鹏摄于 2013 年。

图三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之“槟城温氏藏书”印章。

这批书马大东亚图书馆内最大一笔个人藏书，温开西先生厥功甚伟。这批收藏不仅使我们对百年前的一位槟城闻人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也令笔者对清末民国槟城的华人文化之盛有了进一步的感知。月前去槟城田调，发现华人在槟城历史上所留下的文字之多，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无论是在闹市中的广福宫观音亭 1800 年的碑刻，还是山坡上的极乐寺大殿内外清末诸多名人书写的匾额，抑或是在僻静的浮罗山背兹山寺、玄武庙中一百多年前光绪年间的碑刻和对联，都能给我一种历史的文化想象。例如光绪皇帝御赐槟城中华学校《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回来后也在清朝典籍中看到。清末马来半岛上的文人阶层之盛，除了新加坡，那就是槟榔屿了，这乃因有了温文旦先生的藏书，我认为这个荣誉当实至名归。

三、文学史之外的何克柔

在马大东亚图书馆的中文线装书中，有一些书的封面上有“HO KER YEW'S LIBRARY 何克柔藏书”印章。很明显，这一批书是属于“何克柔”的，但他是谁呢？在 2013 年初笔者曾就此查找资料，但并没有找到答案。这个疑问就此暂时放下。

答案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最近翻看方修先生所撰《马华新文学史稿》，居然发现了线索。在 1927 年 10 月 5 日，槟城《南洋时报》副刊《诗》创刊，这是北马的第 1 份诗刊，1929 年 3 月 20 日停刊，前后仅办了 1 年半的时间。因中间《南洋时报》停刊数月，以及刊出时间不固定，所以只出了 19 期。不过，它是一个纯粹的诗刊，而且它的立足点在于新诗，对于新诗在马来亚文坛的推动，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活跃在《诗》刊上的诗人，主张“诗言志”，以抒情为主，因此，他们更多地抒发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不做无病之呻吟。他们的诗虽然充斥着一己人生的彷徨，以及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即使咏物写景，也蕴涵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和忧伤。但毕竟多少还有一些反映社会生活，反映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和鼓动自由平等的作品。这些诗人中，就有何克柔，他总共发表了 5 篇诗作。在第 5 期（11 月 9 日），他写有《悔悟》，第 9 期（12 月 14 日）写有《归宿》，此外 3 首译诗亦出自他的笔下。原来他是北马人，上世纪 20 年代曾活跃在当时的北马文坛上。

顺着这个线索笔者继续追寻，何克柔先生的片段生活记录随之陆续被发现。1906 年 9 月，他出生于苏门答腊日里（Deli），大埔客家人，年幼时全家移居到大山脚。他在当地日新小学接受启蒙教育，以及大山脚中学念书。过后，他到上

海汉璧礼西童公学（Thomas Hanbury School）继续读书，接着到复旦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客观环境所限，他被迫辍学回到马来亚，开始在几间华校任教。随后，他经营布疋业，1947年成为北马华商洋货布疋公会的创始人之一，该会早期成员基本上都是客家人。

1948年，他重返杏坛。他在几所学校曾担任校长，包括吉打州双溪大年新民学校、大山脚日新中学、霹靂州太平华联中学、柔佛麻坡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吉打州居林觉民中学和高渊培南中学。此外，他也曾在檳城中华总商会担任2至3年的执行秘书，至到1968年退休。

他也热心社会活动。经商期间，他在各团体及学校担任要职，如北马纺织公会、檳榔屿大埔同乡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大山脚分会的创办人及主席、大山脚日新小学及中正小学委员会的代表。他也曾是大山脚市议会 House Rent Assessment Board 的会员。1949年5月15日，大山脚4大乡团——广惠肇会馆、福建会馆、韩江公会、琼崖同乡会召集华商大会，讨论组织福德正神理事会，会议由他负责记录。1950年，他撰有《大山脚潮侨概括》，收录于潘兴农主编的《马来亚潮侨通鉴》。1964年8月，当时威省客属人士，因感本属民众遍居威省，为数颇聚，因缺乏组织，平时极少联络，为此借日新中学办公厅召开同属人士座谈会，讨论成立“威省客属公会”，他任顾问，以及“起草本会章程小组委员主任”。他于1977年去世，享年70岁。

何克柔先生与马来亚大学发生交集，就缘于这批线装书。笔者查询档案后发现，在1983年6月27日，马大图书馆被一位吉兰丹经营汽车业的商人拿督 Lee Chee Ling 选中，接受他所赠送的藏书。他花了5千元，向何克柔家庭购买这批藏书共69种，捐赠给马大图书馆。这批捐赠的书，就是何克柔先生的收藏，他在1920年代从上海把这批书带进来。出版时间绝大多数集中在民国年间，仅1920-1925年间刊行者就有47种。这批书的刊行时间最晚截止于1925年，证明何克柔先生大概是在1925年后离开上海回到大马。

如今马大现存属于“何克柔藏书”的线装书，尚有54种，计423册。古典文学方面就有34种、293册之多，且以文学总集为主。其中仅有关《昭明文选》就有《评注昭明文选》（16册）、《仿宋孙批胡刻文选》（16册）、《仿宋胡刻文选》（16册）3种，另有《详注经史百家杂钞》（16册）、《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16册）、《杜诗镜铨》（6册）、《百大家评点东莱先生古文关键》（6册）、《诸大

家批评吕选八家古文》(6册)、《评注唐宋八家古文》(12册)等等。经学方面也有 10 种,如《春秋经传集解》(6册)、《近思录集注》(4册)、《孟子》(3册)、《大学》(1册)、《周易》(3册)、《经义述闻》(20册)等等。史学方面虽仅有 4 种,却有 82 册之多。如《百大名家著作汉书评注》(32册)、《加批增补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18册)、《评注后汉菁华录》(16册)等。可见何克柔先生藏书的主要侧重点。

何克柔先生曾经在 1920 年代上海求学,当时中国尚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笼罩之下,“文学革命”理论上建立了全新的文学观念,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实现了言文合一。抛弃了传统的“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的旧文学观,确立了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现实的新文学观,使文学更接近人民、接近现实。或多或少,他都应受到了这个文学潮流的影响。

四、马来亚大学线装书中的佛教典籍

在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线装书中,一些书籍的尾页有铅笔书写的“gift: Mr. Van Thean Kee 5.11.1964”,因为没有中文注名,猜测可能是一位英校生,可能姓“范”或“樊”。他捐赠有的多是有关佛教的典籍,现存有 56 种,约 200 册。

经过查找资料,可知 Van Thean Kee 出生于 1921 年,出生地可能是在怡保,他曾在那里的英华义学学习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沙登(Serdang)农业学院。当日本入侵马来半岛,他被迫中断学习。在日本战败后,他回到沙登,1946 年完成学业。他是一个身手敏捷的运动员,曾代表农业学院参加曲棍球和排球的比赛。毕业后,他到柔佛北部的昔加末(Segamat)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表现优秀。1947 年,他被选为马来西亚农业服务协会柔佛分会委员会委员。1948 年 8 月他在《马来亚农业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据时期台湾稻谷在霹雳州的栽培》,日后被研究马来半岛农业的学者广为引用。1949 年 8 月,一项“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奖学金”授予年轻的 Mr. Van Thean Kee, 9 月他进入英国的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开始为期三年农业课程的学习。三年后,他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回国以后,他长期在农业部担任高级农业主任,曾在 1956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稻米委员会特别会议”担任会议副主席。

他所捐赠的书籍集中于佛教有关的典籍。经典原文有《妙法莲华经》、《遗教经八大人觉经四十二章经圆觉经》、《净土五经》、《金刚经笺注》等,高僧撰述有《释教三字经》、《印光法师嘉言录》、《圆悟佛果阐释语录》、《觉真禅师语录》、

《中峰广录》、《冶开镕禅师语录》等，甚至还有日本僧人“老螺蛤”天桂的撰述《坛经海水一滴》。信徒撰述也有一些，比如曾任民国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所撰《大悲心陀罗尼经补注》、《波若波罗密多心经论注》等。也有佛教史的学术著作，如吕澂的《印度佛教史略》。当然，他的捐赠并非全部都有关佛教，如其中就有《康熙字典》和《国史读本》各一册，甚至还有一套有关明清云南人物的碑传类历史文献——《滇南碑传集》。

这些书是如何到他的手中呢？因为关系到书籍的流播，故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有一些书上另有赠送者的题字，如《妙法莲华经句解》、《佛说四十二章经解佛遗教经解八大人觉经略解》书内就有“融熙老法师供养香港佛经流通处敬赠”。前者无印刷年份，后者有“岁次乙未佛成道日香港佛经流通处影印”，可知为1955年所印刷。《来果禅师语录》封面“融熙老法师惠存弟子郑道禅敬赠一九五四年六月于香江”。《六祖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明文征仲书赤壁赋真迹》封面分别有“释融熙”、“融熙”印。可知这些书原属融熙法师所有。

融熙法师（1888-1959）是现代马来西亚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原本出生于广东番禺，民国年间历任番禺小学校长、广东省教育厅视学官、广州国民政府中央法币基金委员会委员、陈济棠“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秘书等职。业余时间组织广州佛教阅经社（1920年）、六一佛学研究会（1933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服务于粤北，有机会亲近虚云老和尚，遂皈依于老和尚门下。1947年创办《圆音》月刊。1949年避乱香港，依融秋法师座下剃度。1954年赴新加坡，往返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弘法，并于吉隆坡创办“马来西亚佛学社”。1959年示寂于吉隆坡。可知上述属于法师的经书，有的是在香港时别人赠送，有的是他来到新加坡以后，香港佛经流通处寄来赠送。还有的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收藏。另有一套《首楞严经疏》（八册）首页有“融秋”印，应该是融熙法师剃度后，融秋法师所赠送者。

融熙法师圆寂以后，他的个人藏书是如何转到了 Mr. Van Thean Kee 手中，二人是什么关系？笔者尚不可知。我们从现有资料不能得出 Mr. Van 是佛教信徒的结论，但通过融熙法师的书转到他的手里，似乎也可以有一些联想。1964年5月11日，Mr. Van 将这批书捐赠给马大中文图书馆。而在前一年，马大中文图书馆刚成立。如今这批书就成为了马大东亚图书馆重要的收藏内容。